

上 海 故 事

(日)横光利一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上海故事

〔日〕横光利一 著
〔日〕八木 泉 解说
滕忠汉 王志平 译
宋 崧 李 军 校
汪 平 乔 云 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上海故事

滕忠汉 王志平 译
宋 崧 李 军
汪 平 乔 云 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字数: 14 万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7 $\frac{1}{2}$
印数: 1—500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 晔 封面设计: 宋丹心
责任校对: 石 云

ISBN 7-5382-2564-1/G·1909
定价: 5.80 元

《上海》之我见

八木 泉

上海是我所憧憬的都市。十八岁时我读了本从图书馆借来的破旧泛黄、薄薄的小册子之后,上海的街市便始终牵动着我的心绪,难以忘怀。这么说也许给人一种印象,即我年青时便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和观察能力。可当时我不过是个对战争和有关现代中国的起码知识了解甚少的少年。对我来说,上海街市本身不过是对遥远的异国之单纯、童稚般的憧憬对象而已。横光利一素以写令人难懂的文章而大放异彩。他的小说《上海》,与其说是包容了诸多问题的文学作品,不如说只是一部描述悲惨年代那不可思议的街市的作品。当时念高中的我对于作者的苦衷、战争的实情,甚而连这篇作品具有的文学意义还几乎不能理解。然而,至今我还记得:只有那种身为日本人的奇怪的内疚化作漠然的读后感残留在我的心底里。“憧憬与内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尚未理清,我的大学生活便开始了。记得这件纯属偶然的小事,发生在日中友好的历史之门开始打开的 1972 年。今天想来,它却真是大大地左右了我的人生。可当时我只能一味地梦想着既是必然却又那么命运难卜,不知何时可以实现访问中国的愿望。

从那以后,十七年的岁月过去了。1989 年 10 月,我初访

中国的机会终于来临。对于在斗转星移之中不知何时立志投身横光利一文学研究的我来说，上海早已不再是光用“憧憬与内疚”便能说清的街市了。后来，我加入了1990年创建的“日中文化研究会”，每年都有机会访问上海，与来自上海的赴日留学的留学生以及“日中文化研究会”中国方面会员的交流更加密切。对我来说，上海这个地名所具有的含义已有了不同以往、更加深远的意义，它还将影响我整个人生。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我面前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照片。那是我第二次访问上海时，在人民公园拍摄的一张“五卅”运动纪念碑的照片。望着这远比旧上海南京东路上的石板碑显得巨大、气势宏伟的纪念碑，便能充分理解中国人民对“五卅”事件的心情。它不仅象征着鼓舞中国人民的团结，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精神，而且也是令曾经企图侵略中国的诸多外国人猛醒的标志。说来也巧，在我访问中国期间，这座纪念碑也正好在建设之中。从我个人的心情来讲，并不想将其看作是单纯偶然的巧合，故而决意把这幅照片挂在我的眼前。因为每当我站立在纪念碑前，心中总要激起一种强烈的意识：作为一个人一定要干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对我来说，作为日本人，同时又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拥有几位亲切的中国朋友，出版中文版《上海》这部作品，虽使我感到宛如置身于日中两国人民和国家间巨大历史潮流的颠簸之中，但却也只能认为这不过是用另一不同的立场去陈述那至少确实相互联系着人们的生活。这并非不去正视由战争造成的不幸的、非道义的历史现实，而是因为必须注意到这其中包含着人们充满苦涩的生活历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小说《小海》中所描写的许多情况确是当时的日本和欧美各国遗

留在他们心中难以忍受的伤痕。同时，要想起脱不愉快的心情一气读完也是不太可能的吧。至于对于像我这样在战后十多年才出生的日本人来说，面对以往沉重的历史现实，不能说没有一种痛苦和赎罪的意识。那么为什么要在日中恢复友好的历史已达二十年，两国的交流正在日益加深的今天，出版一本描写被害者与加害者双方悲惨历史的文学作品，有这个必要吗？持这种疑问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吧。也有人大概会问：这部作品对于日中两国的现状有何意义？但持这种疑问的人毕竟只是少数，我坚信这篇作品的翻译问世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小说告诉我们的并非只是过去我们共有的不幸月岁，而且也是不只是现在，即使将来也要靠理解和信赖去生活的我们应该记取的沉重事实和历史教训。

小说《上海》的作者横光利一，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出生在父亲工作的福岛县。父亲是一位建筑承包商。幼年时期，横光利一跟随父亲辗转日本各地，直到进入学龄期，这才回到母亲的故乡三重县伊贺市定居。后从三重县立第三中学（现在的三重县立上野高等学校）晋升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但因患神经衰弱而休学。后来虽返校复学，却还是于1921年（大正十年）中途辍学。休学期间，他曾一面向文学杂志及报刊投稿短篇小说，一面创办同仁杂志《街》、《塔》，并继续发表作品。1923年（大正十二年），出任《文艺春秋》杂志编辑。同年，他发表的《日轮》、《蝇》，巩固了他作为新作家的地位。第二年，又与川端康成、片冈铁兵等人创办文艺杂志《文艺时代》，终于成为新感觉派文学运动的中心人物。所谓新感觉派文学运动，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欧洲兴起的未来派、表现主义、达达派、超

现实主义等前卫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学运动。它采用巧妙新奇的构思技法,灵活运用拟人法和电影艺术手法来尝试开拓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尽管当时正值无产阶级文学的全盛时期,但无论是新感觉派文学,还是无产阶级文学,这二者都是以反对自然主义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写实主义文学而独树一帜的。它们一个是要追求方法上的艺术革命,一个是要追求思想上的革命艺术。然而,在超越既成文坛文学这方面,则可以说二者的立场是一致的。作为新感觉派的实验作,横光利一发表了《头与腹》(1924年)、《拿破仑与金钱疮》(1926年)等作品,并且加入了由多产戏剧作家衣笠贞之助等人发起成立的新感觉派电影联盟。《春天乘着马车来》(1926年)是新感觉派时代的成功之作。作品倾注了作者对身边相继遭遇不幸的亡灵的安魂和诀别之情。进入昭和年代后,他独自对社会与人的问题进行过富有挑战性的探索,相继发表了《上海》(1928—1931年)、《机械》(1930年)等探索性作品。尤其是在《机械》这篇小说中,作家吸收新心理主义文学的素养,鲜明地勾勒出人的思想从感觉延伸到心理的转换轨迹,一举成为艺术派作家中令人瞩目的典范。而在《徽章》(1934年)中,作家进一步进行了以克服自我意识为主题、塑造行动上敢于冲破知识分子阶层之清规戒律的人物形像的尝试。第二年,又在此基础上发表了题为《纯粹小说论》的文章,提倡通俗小说也是纯文学的观点,并发表了实践作《家族会议》(1935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后,以1936年欧洲旅行为契机,他花费约十年时间写作他的巨著《旅愁》。这部未完成的巨著,反映出作者对贯穿于东洋和西洋之间思想、文化上的裂痕的感悟,以及对鼓吹全盘西化的近代主义思潮的反抗,其追求的主题是要塑

造一个足以与其抗衡的日本形像。战后,横光利一因未能积极反对战争而与其他许多作家一道遭到批判。终因病魔缠身,他既没有自我辩解也没有给以反驳,便于1947年12月30日故去了。我以为围绕战争对横光利一的评价须和其他作家一样,有待于今后从更多的立场出发进行致密的研究。这可以说是这位通过小说经常每感地捕捉时代脉搏、站在时代前沿提出许多遗留至今的课题的作家——横光利一所应有的归宿吧。

综观横光先生约半个世纪的人生,便可以理解:即使在日本作家中,他也算是位才能特异的作家。同时,也是在一定意义上肩负着不幸时代的作家。他的一生中约有一半,近二十五年时间是作为小说家度过的,而这当中约十分之六的时间,有十五年正好是整个日中战争期间。好比说他后半生大半时光是在倍受战时种种限制之下度过他小说家的生涯的。《上海》便是步入作家人生的横光以1928年4月起约一个月的访华体验(几乎全是在上海度过的)为中心,写成的最初一部长篇小说。全文于同年11月至1931年11月,断断续续在当时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文艺杂志《改造》上发表。翌年(1932年)7月,由改造社出版发行了单行本。仔细研究小说的发表年代即可以理解,《上海》这部作品是在怎样不幸年代的制约下发表问世的。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强化军国主义意识的进程之中,只要把小说的舞台——上海浓缩成共同租界这一侵略中国的桥头堡,那么这篇作品所包涵的种种问题的焦点也就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了。单从那样的年代与作品的关系来看,在日中友好的今天特意将《上海》介绍给中国读者,其意义可以说是很大的。我以为:正是在两国人民相互加深理解和信任的今天,重

新以崭新的现代眼光再现、吟味一个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在小说《上海》中尝试以文学手法剪辑人生和社会历史的意味，还是颇有必要的。

对这篇作品，横光利一在1932年出版的单行本序言中曾有过如下叙述，引用起来是长了些，但是考虑到作者的意图和当时的情况，本文决定全文引用：

这部作品最初部分发于昭和三年十月，在《改造》上刊出，随后按文章顺序断续在同一杂志上连载，最终部分是在昭和六年十月仍由《改造》刊出。正当汇集全篇之际，上海事件突然爆发，使我对小说题名倍感困惑。但上海这一题名早就与山本先生有约在先，况且也寻不出与素材相一致的其它题名来，否则人们自然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故而，决意仍用上海作题名。这篇作品中所展现的背景便是“五卅”事件。它在近代东洋史上被称为欧洲与东洋之间最初发生的新战役。但要深刻地描述这种以外国关系为中心、无法避免的巨大漩涡，除了描述手法本身的困难外，还有出版方面的困难。我原打算尽可能忠实于历史事实，但越是逼近事实本身，就越不能不感到不便于下笔，反而只能笼统概述一下事件的经过。因此，由我个人独创的专用名词，也只好任凭读者的想象力去领会了。这种不愉快的作法，在小说欣赏中是随处可见的。“五卅事件”是大正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以上海为中心发生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已将每年的这一天

作为民族纪念日，其隆重程度远远超过五一劳动节。而昭和七年爆发的日中事变，其起因很大程度上便是从这里引发的。我写这篇作品的动机与其说是想写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倒不如说出于一种孩子般的心情，即要进一步了解生我养我的悲惨东洋。当我了解到知识分子阶层中很少有人关心“五卅”这种重大的历史事件，甚至几乎无人知晓时，一种不知不觉已经忘怀了的青年时代的热情便被唤起来了，必须让人们了解事件的真相！

序中的“山本先生”，是指当时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先生。他与上海内山书店的主人，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亲密朋友，为中日文化交流奉献毕生精力的内山完造先生交往甚深。至今，上海鲁迅纪念馆内仍陈列着他们三人开怀畅谈的照片。这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更显得他们始终如一的深厚友谊。对于横光访华的动机，有许多各不相同的说法，其中尤以先辈作家芥川龙之介推荐的横光访华之说最具代表性。然而，从横光本人与山本实彦的交情来看，不难想象，横光可以通过山本他们三人象征深厚友谊的细致交流，直接获得大量有关上海的情报。以横光这样的立场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为前提去理解前述序文尤为重要。这样就能了解横光利一个人的思想和信念，还能对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中存在的思想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当时，军国主义统治笼罩了日本全境。镇压言论自由给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尤其是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对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的镇压达到了极为残酷的

地步。而曾被视为是新感觉派代表人物的横光虽作为艺术激进的论战者,与无产阶级文学进行过广泛的论战。然而,从保留下来的许多评论来看,他的立场并非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学本身,而是为了探索新的艺术方向而把无产阶级文学作为进行文艺方法论论战的对象而已。可以说,他对无产阶级文学是有所领悟的。他最初就很重视这样的观点,即无产阶级文学的兴盛不单纯是因为有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还要考虑这种世界观的根基,即现实黑暗不安的社会形态,其本身便能诱发无产阶级文学的勃兴。而且,与无产阶级文学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艺术观来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一样,他本人也感悟到必须寻求某种理论来面对社会现实。横光还认识到,当时的日本社会要想从资本主义的现实中产生飞跃是不可能的,因而政治形态不会改变,而变化的只是个人本身。这并非是流于现实的观点,而是用道德的悟性去捕捉作为现实反映的本身(人类社会),再用于重新塑造社会现实的产物。因此,作家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现实生活之锐利的敏感。所谓新感觉派,首先就是要把这种锐利的敏感放在第一位,来论证自身艺术立场的优越性。他正是主张用这种优越性来替代“某种理论”的。但是,从无产阶级文学主张以社会主义革命根本变革社会本身的立场来看,他的这些观点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艺术变革来改变人性。二者只是局限于艺术方法领域中的相互争论,大的趋势方面争论并不激烈。不怕误解地说,这样一种局限性的社会观并非只是横光独有的思想特征,相反,可以说,这正是当时大多数日本人之社会观的象征性体现。由于昭和三年无产阶级文学及其作家遭到大举镇压,使得这场论战没能最终得出明确的结果。而《上海》恰好是在这场最大的悲

剧性的时期里发表的。

序文中“除了描写本身的困难外,还有出版方面的困难”,是有感于“不能不感到不便于下笔,反而只能笼统地概述一下事件的经过”而发的。这也与前述横光的立场和围绕其立场的现实社会形态不无关系。另外,对于“五卅事件”的起因,故事中明确记载,是因为日本人经营的纱厂发生爆炸事件所致。因为横光当时只能被迫违心地站在日本一方面干着与欧美列强同样的侵略勾当,企图借口防止亚洲各国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来谋求其军事侵略的正当化这种矛盾的立场上,故违心地采纳了“五卅事件”是近代东洋史上欧洲与东洋最初的新战役的说法,“昭和七年的日中事变的渊源也多半是由此引发的”这种极力不涉及日本人责任的说法。这也正是他内心苦闷彷徨之淋漓尽致的表现吧,同时,也清楚地反映出横光利一这位作家,其思想矛盾和人性脆弱的一面。但是,反过来,不应忽视他在对“知识分子阶层中很少有人关心‘五卅’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甚至是无人知晓”这一日本社会现实表示愤慨的同时,表示“倒不如说是出于要进一步了解生我养我的悲惨东洋这种孩子般的心情写作的”,“必须进一步让人们知道了解事件的真相,一种不知不觉已经忘怀的青年时代的热情也被唤起来了”。横光的这种心情,不正强烈地反映出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充满青春朝气的正义感吗?

简单地说,《上海》或许就是这样的小说,即:敢于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从正面直视严酷的现实而完成的作品。况且,作者横光并非是“想写出优秀的艺术作品”,而是凭着对己“要了解现实生活”,对读者“务必让其知道”的“热情”写成这部作品的。的确,序文中表现出的一腔豪情虽然也面临着“我原本虽

打算尽可能地忠实历史事实,但越逼近事实本身,越感到不便于下笔,反而只能笼统地概述一下事件的经过”的不利条件,但终究可以说,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事实上,有很多日本人正是通过《上海》了解了“五卅事件”。这也确是日本距今近七十年以前的现实状况。小说《上海》描写的以日本人为中心发生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事情,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却起到了好比是一篇报告文学作品的作用。严格地讲,把小说创作说成是报道文学确是一种矛盾的说法。而且,从报告文学真正的定义来看,也务必要求始终贯彻自由、公正的原则立场。应该承认,当时日本人还不可能从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误解中完全解放出来。但是,在《改造》连载的过程中,原稿的许多内容经当局审查后,以“……”的形式被大段大段地删掉了。考虑到这种时代的现实,便可以看出横光是在超越当时日本知识分子思想水平的视点,上,尽力冷静地以酷似报告文学的缜密手法来描绘“五卅事件”本身,以及上海这个体现了当年混沌世界的街市。

横光在《上海》中描述的故事是以“五卅事件”为顶点,前后约一个月之间发生的历史事件。1925年2月前后,以上海、广州为中心,中国工人运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迎来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纪元。在上海,欧美和日本资本家开办的纺织公司,中国工人不断举行罢工和暴动,且事态渐渐向着更高层次发展。纺织工业是那时中国产业的主力,经营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以同样的手段发达起家的,即以极度低廉的薪水换取工人的劳动成果。资本家甚至连工人最起码的生活要求也不予考虑。而且,在本国政府的庇护下,各帝

国主义经营者们把连在本国都是违法的劳动待遇心安理得地强加在中国工人身上。同时,由殖民主义派生出的蔑视中国人的意识的滋生,助长了他们对工人为所欲为的野蛮暴行。压迫反而促进了中国工人的团结和民族意识的高涨。横光就是直接以这样的历史状况为背景,展开叙述的。小说以一味地只知诚实待人,却因此对人对事处处谨小慎微,为生活笨拙地疲于奔命的银行职员——日本人参木为主人公,塑造了一批分属各个阶级的人物形像:有参木童年的好友,为人圆滑、轻薄、庸俗,混迹于共同租界的商社职员甲谷;有中国富豪钱石山和他的小妾阿柳,他们身为与工人对立的民族资本家,但当日本资本家开办的纺织公司爆发罢工时,却自觉地出资赞助反日宣传,为工人组织总公会出谋划策,撑腰鼓劲。在他们身上,中国民族资本家所具有的两面性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有在阿柳的土耳其浴室陪客的薄命红颜阿杉和酒吧舞女官子;有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容颜娇美的中国妇女芳秋兰;还有东洋主义者、贪婪凶残、阴森冷酷的商人山口;有印度国会派的议员阿木里;有白俄少妇奥尔加;以及纺织公司的工头、甲谷的哥哥高重等等,……他们陆续出现在“五卅事件”后上海动荡不安的街市里。在这些登场的人物中,尤其是对参木、甲谷、高重三位日本人绞织成的人生命运的安排,意味深长地折射出作者横光的人生观之一斑。尽管他们三人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在“五卅事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的人生之旅均遭败迹。庸俗刁钻的商社职员甲谷,他之所以尚未看清前途即被卷入一场称得上社会变革的事件中,且终遭败北,这是他作为商人的必然归宿。而对参木和高重,倒不只因这种外在的要素而失败的。高重身为荷枪实弹巡察工厂的工头,很明显,他是站在帝国主义

资本家走狗的立场上的,这种职业本身应使他成为集工人的憎恶与反抗于一身的人物。但是小说中的高重却是一位对中国工人持宽容态度的管理者,“必须保全职工的面子,也要保全老板的面子”。乍一看,他的言行似乎是理解工人运动的,甚至对试图潜入帝国主义资本家控制下的工厂通过奥尔加从内部进行革命鼓动工作的芳秋兰的革命活动也予以默认。但是,到头来,他还是冷笑道:“都是这个女人在捣蛋,得给地点颜色看看”。这便暴露了他不能正确认清自己置身的社会现状的弱点,陷入了小知识分子之认识片面不足的境地,最终发展到向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开枪镇压的地步。他的立场表明,他越是想以人道主义的态度来为自己装璜门面,自己的人格假面便越发暴露无遗了。可以说,作家正是把他当作因内心的优柔寡断才遭到失败的人物来描写的。参木,可以说是作家为读者设定的一个极富善良人格与良知的人物。他的良知与善良,被朋友们当作是唐吉珂德,受尽了无情的嘲弄。他与大多数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同,别人滥用满含杀机的金钱万能的法则,不择手段地大发横财。而他则胆小怕事,对待任何事情都要一本正经地考虑再三。作为一个诚实的日本人,东洋的贫困和西洋的殖民地政策,加之日本的野蛮侵入更加引起被誉为国际都市的上海的混乱不安。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十分苦恼。有时,他也会在兴奋之余称自己是爱国主义者,然而每当他想到:自己这么样地大声疾呼爱国,却被可爱的祖国放逐到这异国他乡,便打心眼里不甘作一个国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每次他独自来到这殖民城市上海,总要非常痛切地感到,“肉体占据的空间正在不断地沦为日本的领土”,而自己也和被称为共同租界的上海街市所处的无国籍状态一样,不过是被自己祖国抛弃的

游子而已。

那么,作者横光利一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显得软弱无力的日本青年——参木,抛向上海这混沌的街市,他要告诉读者什么呢?一个一眼便让人觉得毫无心计、胸无城府的青年,为了营救自己心目中怀有一丝恋情的爱慕对象芳秋兰,上演了一出舍命救美的英雄戏,而恋爱却又毫无结果。作者将一个失败者的标签贴在这样一个青年身上到底是为什么呢?把这位青年逼进甚至让人感到虚无飘渺的悲惨结局,意义何在呢?在读《上海》时,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也即在被称为中国革命前奏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一个有良心的日本人越是想要正确了解周围的现实,就越是看不清自身的存在意义。作者执着地描写这样一类人物的命运究竟隐含着什么意图呢?

透过这些疑问,我仿佛见到了作者自身鲜明的身影。当然,这并不是说横光利一是与参木一样的人;而主要是指横光本质上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在人格方面有着共同明显的特征。而且,还可以认为,这至少也是作者自身本质的一部分。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其代表作《旅愁》中的矢代,还是《机械》中的“我”,以及《徽章》、《悲哀的代价》(横光去世后,由其友人川端康成于1956年整理出版的横光初期作品),其中的主人公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无一不是迫不得已采取退避容忍的态度。身处动荡黑暗的年代,他们既不是盲目抗争,又不是超然物外、全然漠不关心,而只是默默地忍耐这一切,承受这一切,一味地苦思冥想这一切,很少有人敢于奋起抗争,可以说逆来顺受、顺其自然的人占绝对多数。但是,也有例外,这在他的处女作《日轮》和早期的短篇中还可以找到几

个。但不能断言,这便是作家横光利一的弱点,倒不如说是他自身诚实人品的反映,更是在承受、容忍、吟味这一一切的过程中所追求的知识分子个性侧面里的理想主义的态度。综观横光的人生,便可以察觉到,他一生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称得上生活磨难的事件,又都是不得不承受忍耐的悲痛体验。恋人被友人追取共枕、年轻地便死了爱妻、母亲和亲友们接二连三地相继死去,以及关东大地震的灾难性体验,等等,不都是无论如何必须承受和忍耐的事情吗?在描写为患病的妻子治病以及追忆她死去的小小说《春天乘着马车来》(1926年8月《女性》杂志发表)中,他这样写道:

他还没有意识到要避开接二连三向自己袭来的痛苦波澜。这是因为他总是认为这些性质各异奔袭而来的痛苦波澜,都渊源于自己的最初感受。他决心像用舌头舔尝砂糖一样,调动起自己全部的感觉器官去一边吟味,一边尝尽所有的痛苦。这样才能最终弄清什么样的滋味是美的。他想:——我的身体只能是一只玻璃瓶,一定要比任何东西更加透明。

这里有着横光来自于悲痛体验的生活原型,也可以说是他认识的原点,即不得不在意识上强行强化生与死的极端对立。通过自己“肉体存在”去谋求验证人们所受的痛苦,这种态度不过是在肯定承受忍耐现实的基础上获得的认识论。这样想来,乐于塑造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承受忍耐社会现实的人物群像当是横光的一种很自然的文学态度,而且,这些本身或

许可以说就是贯穿于他作品中隐含着的主题。

总而言之,《上海》中的参木也还是清楚地感到在“五卅事件”后革命势气高涨的上海,自己不过是毫无气力、无所作为的外国人而已。作者假托参木这个“上海异邦人”所要说明的,便是一种只能以“失败者”的形象来承受忍耐痛苦现实的个人命运。这是因为,所谓社会性变动的巨大势力抹杀了个人要求人性自由的呼声,横光在这里提出一个答案,革命的民众运动最根本的东西并不与人们本质上所共有的自立意志和向往自由的愿望有关,随着这种民众运动的规模 and 力量的不断壮大,发展成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个人的一切意志和愿望都将为这巨大的社会运动所吞没,最终还是逃不开为这种社会趋势所扼杀的命运。这是一种冷峻、严肃的现实观。横光从潜在于革命本质中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悟到的,也正是他所追求的文学性主题。事实上,他在《上海》以后的作品中,也是一贯地继续追求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忍耐社会现实的个人命运。因为我感到,横光描写的主人公们几乎都是作者自己亲身经历的真正写照,他们也都源于横光所特有的这种充满绝望的命运论、人生观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即使在近代日本作家中,像横光利一这样明确写出知识分子的孤独愁苦以及绝望之情的,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作品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是继续探讨的主题。比较一下在当今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中飘浮不定的人类与《上海》中登场人物的命运,便会明白为什么小说《上海》和作者横光利一虽然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却依旧深受今天读者欢迎的原因了。

《上海》刊登之际,较之通俗性的作品,评价并不高,在无

产阶级文学方面则被完全否定了。另外,从对横光战时的立场与言行的批判来看,姑且不谈作品本身的性质如何,它确是横光利一的一部带有悲剧色彩的力作。因为它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仅仅根据那些局限性的观点是很难评价横光的作品。这其中的道理不辩自明。

回顾最近这十年的日本文坛,研究者仿佛受到井上谦、保昌正夫、栗坪良树等人对横光的不幸年代进行缜密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激励,陆续发表了许多研究横光的学术文章,这些都表明了一种心愿,要对横光一生的是非曲直给以正当的评价。随着1981年开始的《横光利一全集》的出版发行,以《上海》为首的几篇代表性作品陆续再版发行。在这种盛况空前的热潮中,由日中双方有关人员通力合作,出版中文版《上海》,的确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对日中两国的读者来说,也是件不胜欢欣的事情。愿这种交流不断增多,化为进一步加强日中友好之纽带的基础。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愿借此机会向有关各位以及中文版《上海》的读者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1年9月8日

八木 泉 简历 1954年4月17日生,三重县人,明治大学文学部毕业,就读本校大学生院(研究生)。现任秋草学园高等学校教谕,现住东京都立川市。

序

横光利一

这是我最初的一部长篇。和现在不同,那个时期我只是希望自己首先倾注全付的精力去观察外部世界。因而,也可以说,这部作品正是这一愿望的最终体现。因为每当我想要描绘一个作为既包含着人类,更包含着自然的外界运动实体——海港时,上海便浮现在我的眼前。这篇作品于昭和七经由改造社出版发行。不过,今天看来,她仍是我最尽心力的作品,就这么不再想她实感割舍不下,故决定对全篇作些文字上的改动。幸蒙书物展望社之厚意,使我能再次对其进行整理,甚感欣慰。就以此书稿作为《上海》的最终定稿版吧。

涨潮了。黄浦江顿时臃涨起来，逆向朝上流涌去。矗立在江边的水情观测站的塔顶上，信号机显示出的信号表明风速平和。海关大厦的塔尖在夜雾中也渐渐地模糊起来。码头苦力们正在搬运堆放在江边堤岸上的木箱，个个汗流夹背，浑身湿透。江面上，一面黑色破帆正倾斜着，“咯吱咯吱”地随着滞重的江水浮动。参木拐过街角，回到了外滩。只见他一付白皙、秀气的面孔，眉宇间仿佛带有一种中古时代勇士的神情。靠近江边的长椅上坐着一群面容疲惫的俄罗斯妓女，顺着她们漠然的视线望去，一条小舢舨正逆流而上，远远地可以看见那船上晃动着的青灯。

“喂，这么急啊？”

一个妓女扭身转向参木，用英语问道。他看见那女人的双下巴形成的肉逢里有个白色的斑点。

参木默默地与那女人并肩坐下来。那边停泊着汽船熄了灯，头靠头一艘接一艘地被锁链绑缚在栈桥的黑柱上。

“有烟吗？”女人问。

参木拿出一包香烟。

“每天晚上都来这里？”

“嗯。”

“看样子没钱了吧？”

“钱没啦，国也没啦。”

“那可真够苦的。”

帆桁上，水雾缭绕，像蒸气一样飘了过来。那女人点着烟卷。栓在石头岸墙上的那只船，每随波浪摇晃一下，舷头上写着船名的罗马字母便会在瓦斯灯光的映照下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来。一群支那人正蹬在木箱上赌钱，从他们那边不时地可以听到混钝的、铜钱碰撞的声响。

“不去啦？”

“今晚不行啊！”

“真没劲！”

那女人绞起双腿。远处，一辆马车正打桥上通过。参木掏出怀表看了一眼，心想甲谷马上就要到了。他约好要给甲谷介绍一位名叫官子的舞女。甲谷是一位在新加坡经营木材生意的商社职员，他从木材堆里抽出身来到这虚幻混浊、不明底细的上海，目的是为娶个妻子。瓦斯灯的灯光从打湿了的菩提树的空隙中一缕缕地照射下来，照射到妓女们已起皱的鞋头上。透过缕缕灯光，可以朦朦胧胧地看到一阵阵雾气在急速地移动。

“回去吧。”有个女人说。

妓女们站起身来，扶着铁栏杆一个个地走了。走在最后的是个年轻女子，发青的眼睛不经意地向正叼着烟头的参木回眸一望。参木顿时感到有种梦幻般的悲凉袭上心头。因为这使他回想起竞子和他告别的情景。当时也是像她那样，竞子看了他一眼，然后便消失了。

妓女们跨过栓船的黑缆绳，消失在木箱背后。在她们身后留下一块被踏烂了的香蕉皮，上面还沾有一根浸湿的羽毛。从

堤岸尽头那座巡警瞭望塔的入口处，可以看见门岗穿着长靴，露在外面的两只脚。参木独自一人坐在长椅上，想起了家中的老母亲。母亲她虽然一直过着艰苦的生活，却不断地寄来使他倍感亲切的家信。——他已经有十年没回日本了。这期间，他只是在银行里靠昧良心的笔去填补被专务侵吞了存款所造成的亏空。他已经开始懂得了忍耐的含义。所谓忍耐不过是一种努力罢了，它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用正真的眼光去看待别人的坏行为。这样一来，他觉得这种努力是那样的愚蠢、无聊。无聊得使他觉得还不如死掉的好，便不知不觉中沉溺在死亡魅力的诱惑之中。即便是每天与别人一起说笑的时候，他也一定会不止一次地思考着寻死的方法，仿佛这已经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寄托之法，碰上和甲谷一块喝酒时他常这么说。

——你认为赚它个几百万块钱，就算大功告成了。可我不，我觉得当我把头套进绳圈里，再用力一脚踢翻垫脚的石头，那才是成功呢。

他只是经常地这么妄言死亡。但是一旦母亲的面容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第二天早晨他便依旧是把脚伸进裤腿，迈出门去。

——我活着不过是为了尽一份孝心。我的身体是母亲的，母亲的！我可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啊——。

事实上，参木所能做的，仅仅是不时地流着眼泪回忆起自己那久远的儿时的不幸生活。他常在哭泣的时候在心里对自己说。

——唉，就在这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吧——。

然后，他便双手插进衣袋，像赶庙会一样，去观赏各国商人那自卖自夸、大吵大嚷的交易场面——。

4 上海故事

然而自打甲谷从新加坡来到上海之后，参木一下子恢复了久已不见的锐气。甲谷和他打小学时就是最要好的朋友。参木心里一直深深地爱恋着甲谷的妹妹竞子。但这事甲谷却是在竞子出嫁之后才知道的。

“傻瓜！为什么你从不对我透露一句，要说了，我……”甲谷说。

真要是说了甲谷肯定很为难，参木一想到这一点，也就没有作声。而且在这之前，在心里暗暗地为这事着急上火的，也就是他参木一个人。然而，他现在却已把一切事情都想开了。——无论是生活的喧闹、竞子的出嫁，还是日本的高速发展，每当他从海外去瞭望这一切时，便常常可以体察到日本正稳步向前发展所产生的巨大的震动。而这足以让他感到高兴。但是，最近，当他听甲谷说竞子的丈夫得了肺病，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消息后，一种仿佛从自己身上拔去一根钉子的那种自由感便在他的心里油然而升。

这是一片用零乱的残砖破瓦铺成的街区。在它那狭窄的马路上，一群群地布满了身着长袖黑衣的支那人。那情景真像海底里漂动着的海带。讨饭的乞丐们蹲在碎石铺地的小路旁，在他们头顶上的铺面里，悬挂着一串串鱼泡泡和滴干了血、切成圆型的鱼块。旁边有一家水果店，柜台上堆放着许多芒果和香蕉，站在街对面都能闻到那飘逸着的，一阵阵的水果的清香。水果店的隔壁是一家肉铺，店堂里码放着许多开成半片的猪肉。肉堆上搭拉着数不清的去了毛的猪爪子，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肉色的洞孔。光线在洞孔处一下子暗淡下去。旁边塞满猪肉的内墙上，只有一处白色的钟台像只眼睛一样，一眨一眨地映现出耀眼的光亮。

从那家肉铺与水果店之间到一家挂着土耳其浴室招牌的店面的门口前，是一片布满了零乱不齐的砖瓦砾的露天地。这时候，在土耳其浴室那热腾腾的蒸气中，甲谷正一边欣赏着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一边让阿柳给他擦背按摩。他本该去找参木的。阿柳是一位华人富商的小妾，同时兼作这家浴室的老板娘。当然，以阿柳的身份而言，她是不该进入浴客的包厢的。可是为了挑选她中意的客人，让那几间编了号的包厢闲置不用肯定是一种浪费。

以往，阿柳在进入客人的包厢之前，总是要把全身涂满厚厚的肥皂沫，待作完按摩之后才开始给客人的身上涂肥皂沫。

——不一会儿，两人浑身上下真的都成了泡沫人了，只有两颗脑袋黑乎乎地露在外面。

“今晚上哪儿？”

甲谷这才记起该去找参木的事儿。

“参木还在堤岸上等着我呢，现在几点啦？”

“是吗？不过你别去管他，他肯定会上这儿来的。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新加坡？”

“说不准呀，我在为木材公司外联部工作，所以，我估计非得把菲律宾人在此地的木材市场给挤垮才能回去吧。”

“那么，你已经选好太太啦。”

“那里的话，这事不必那么着急——我们最好不谈老婆什么的，行不行。”

阿柳冷不丁地把身上的肥皂沫甩在甲谷的脸上，便跑过去拧开留声机的开关，留声机便和着从墙壁上传出的蒸气送气声，唱起了贝利马音乐。甲谷也和着音乐的弦律，踏着小碎步扭动起来。于是两人身上开始渐渐消泡的肥皂沫便像雪白的棉花一样，“吧哒、吧哒”地滑落下来，露出了原本包裹在泡沫中的身体。不大一会儿，蒸气已充盈了整个包厢，长方形的包厢被笼罩在浓重的白色气雾之中。老板娘和甲谷俩人都觉得茫然看不清对方的脸，雾气中响起了阿柳的问话声。

“你懂玩马票吧？”

“付我佣金吗？”

“那好，我付，不过就是赌输了也没关系的呀。”

“哎呀，屋子里蒸气真让人受不了，把气关一会吧。”

“不过，你应该早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哟，不论是谁，到我这里来，都是经历一次死去活来的痛苦哦。”

说完，阿柳和甲谷都没再作声，送气声也骤然停止了。

三

参木精疲力尽地回到了土耳其浴室，可甲谷这时已经到堤岸上找他去了。参木一屁股陷在客厅的沙发里。浴室深处不断有人在哼唱葡萄牙语的下流小曲，歌声中不时夹杂着陪澡女郎一阵阵的浪笑声。一阵一阵的放气的声响在屋子的四壁震荡，放在桌子上的鲜红的郁金香，低垂着头，微微打颤。这时一个陪澡女郎悄然地走近参木的身旁，她在参木的旁边坐下，抬起头斜眼凝视着参木那高挑的鼻子。

“想睡觉啦吧？”

女孩双手掩面低下头下去。

“有空着的包厢吗？”女孩默默地没有答话。“那么，拜托了。”参木接着说。

参木过去一直就很喜欢这个不爱说话的女孩子，她名叫阿杉。参木每次来这家浴室，阿杉总是躲在女孩子们的肩后，痴痴地凝视着参木的脸庞。这会儿，陪澡女郎们浑身带着溢满了整个长廊的水淋淋的热气，乱哄哄地涌进了客厅。

“哟，是参木君啊，好久没来啦。”

参木双手按在手杖的手柄上撑着下巴，瞪大了眼睛打量着这群女孩子。

“你的脸怎么总让人觉得没精打彩的呀！”一个女孩问他。

“该不是又欠债了吧？”

“急什么，谁能不欠债呢！”

“那么，还让我来浴室吗？”

一句话顿时引得女孩子们哄堂大笑起来。这当儿，阿杉已经收拾好包厢回到了客厅。参木一走进包厢便仰面朝天，横躺在睡椅上，包围在热气之中，他的皮肤开始感到臃胀，渐渐地有点昏昏欲睡了。忽然间，他心里冒出个奇怪的念头，他要就这么放入蒸气一觉睡死过去。于是，他拧开了蒸气开关，然后嘴里叼着毛巾，合上双眼。他感到周身越来越热，他期待着最好能就这么死去。一想到死，他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竟子的面庞，还有那催命鬼急不可耐的脸也若隐若现地在自己面前晃动。他心里明白，债主就是那残忍的专务。专务侵吞了储户存款，造成银行亏空，这一点唯有参木一个人心中有数，要不了多久银行肯定要倒闭。他仿佛看见从银行柜台前的窗口挤进无数张愤怒、绝望的脸，暴风骤雨般地欲向自己袭卷而来。可是，没法子啊，这一切都是因为银行使众多储户蒙受财政损失而引发的呀——。门开了，谁来都行！参木仍旧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躺着。由于屋内的气压过高，眼前的空气仿佛开始晃动起来。于是，他索性拉过一条浴巾遮住眼睛。他意识到这是女老板阿柳。若是阿柳的话，拿她逗逗乐倒是挺开心的哟。

“是阿杉啊，”参木故意唤着阿杉的名字。

没有人答理他。参木这么有意地叫错是为了让正走近他的阿柳知道自己是想让阿杉来陪澡，而且他还想让阿柳知道自己和阿杉玩得多么痛快。他还一次也没有接受过阿柳对他的引诱。因为这事常常把阿柳惹恼。隐隐地他能觉察到她的情欲正在愈加膨胀。他仍旧遮住眼睛，嗤嗤地笑着，一边张开双臂在周围乱划乱摸。

“好啊，阿杉你别想逃，你逃不掉的，看着！我有一双蜘蛛

一样的大手，你等着瞧。”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门猛地一下开了，像是安排好了似的，又进来个人。他觉得气氛不对，马上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好一会，他一动也不敢动，而将全部的意识都集中到被空气舔湿了的皮肤上。忽然，门外响起一阵嘈杂慌乱的声音，倾刻之间，有个女孩子被推搡到他的面前，接着那女孩儿便跪在他跟前哭了起来，是阿杉。——参木一下子明白了所发生的一切。他真想跳起来朝阿柳大发雷霆地光一顿火，可是转念一想，真要这么做，阿杉就会被解雇，便压住火忍住了。参木自己拿掉盖在脸上的浴巾，目光留停在还在哭泣的阿杉散乱的头发上。他一句话也没说便离开阿杉走出包厢，穿好衣服，然后，他走进另一间包厢唤阿柳进来。阿柳满脸抹得煞白，脸上挂着微笑走了进来，她装着没事似的，对参木说：

“哎哟，您今晚玩得可真迟啊！”

“迟是迟了点，不过，我问你刚才是怎么回事？”

“你说什么？”

“别装糊涂，就是那个阿杉。”

“那个丫头片子，别提了，没点血性。”

“那么你让她嫁给我吧。”

“是吗，那样的话，当然行啦。”

参木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一句玩笑，将要改变一个女人的生活。为了救出阿杉我必须向阿柳低头。可是，只要向阿柳低头，那她一定会放出阿杉的。真要那样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参木从睡椅上伸手拉住阿柳的一只手，欲把她搂进自己怀里。

“喂，我说阿柳，我可是第一次跟你提这件事的啊。可不

过，其实这阵子我老是想到去死啊。”他说。

“出了什么事，这么想死？”

“为什么？没有人会知道。”

“不过，我还没碰上过死人的事儿呢。”

“好啊，好啊，我这么实心实意地对你说，可你却对我讲这种话，那我也就非死不可啦。行啦，行啦，说点什么正经话吧！”

阿柳用手捶着参木的肩膀说。

“嗯——我要是不作声光听你讲，待会儿，你兴许要讲一个诱杀美女什么的，听完之后，连我都想去死啦呀！”

说完，阿柳站起身来，想走到包厢的中间，参木又一把抓住阿柳的手。

“喂，过来，你要是就这么甩手走了，今晚上我可危险啦！”

“好哇，你这么想死，那就去死好啦！”

“我死了，最麻烦的不是你吗？”

“行啦，行啦，另说废话了，松手哇，今晚我也想死呢。”阿柳挣脱了参木的手。

阿柳这种无聊的失常之举，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阿柳的怒气，他感到简直是怒不可遏。他躺在睡椅上，慢慢地玩弄着浴毯上柔软的长毛绪，借以平息自己的心绪。忽然，门又开了。阿杉又被推了过来。她趴在地上，头也不抬，又哭了起来。参木躺着不能靠近阿杉，只是从睡床上远远地看着阿杉倒地的后背在微微地抽动。从阿杉还带着茸毛的颈子望去，参木觉得她真像一条黑色的金鱼，娇媚动人。他想跳下睡床凑近些细细地看看阿杉的脸。但是，他猛然间意识到阿柳会藏在什么地方监视着他俩。于是，他又把伸出去的脑袋缩了回来。“喂，阿杉，过来，到我这儿来。”